

綜觀這些文章，平心而論，均達到一定的水準，無論在宗教、戲劇或俗文學等方面，做了相當不錯的分析，使我們對近代中國基層社會的通俗文化有較清楚的瞭解。當我們從整個中國歷史文化的角度去看這本集子的成就，對於作者們刻意強調「明清」是個「全新的時代」，則有令人遺憾的地方。例如：談康熙聖諭，就更要看明太祖的大誥，以及清代的〔十朝聖訓〕，甚至漢唐兩宋歷代皇帝對於教化民眾所做的努力。談「白蓮教」，不僅是追溯這些白蓮家族的譜系，也應該看看佛教與道教在隋唐兩宋所經歷的變化，更應該考慮到外在的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條件。書中所談的各項文化要素，事實上，都可以單獨做上下古今的研究。如是，則我們對於庶民文化的看法應是「抽刀斷水水更流」。1550年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時代分界點，晚明與清代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不是特殊的全新時代。在這三百年裏的各種庶民文化表現，都是前面千百年來已有的文化項目，只是因應時代需求，做了一些修正和改變罷了。

□宋光宇□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y
Susan Naquin and Evelyn Rawsk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70 pp.

韓書瑞及羅友枝教授這本著作綜合了近年有關清代社會經濟的中外研究成果。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為清代社會的靜態描寫，分別討論了政府政策、社會關係、文化生活等問題；第二部分則較強調十八世紀的變化及地區間的分別，也更深入地描述了社會變遷以及這些變化在十個不同區域的具體發展情況，最後從以上的討論來分析十八世紀社會與後來清代衰亡的複雜關係。

在悠久的中國歷史裏面，十八世紀（本書作者其實是指從三藩之亂平定後之一六八〇年代至鴉片進口白銀開始大量倒流的一八二〇年代）算得上為一富庶安定的時代。此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都可說已達到了巔峯。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衰敗時期，不但經濟和政治走入困境，甚至文化也面臨挑戰和危機。許多史學家因此認為強盛的清代中期其實已處處蘊藏著敗亡的種子。這本書的重點就在探討這一關鍵性的時代。

第一部分所突出的是此時中國文明的強盛面貌，第二部分則強調中國內部難以全面控制的複雜性，以及繁榮安定所帶來的種種新難題，包括人口壓力、官僚層過份膨脹等問題。

作者在前言中說明她們深受法國年鑑學派的影響，除了從長時期的角度看中國近代社會外，還特別注意各社會階層的物质以及精神生活。這種寫作觀點在第三章「文化生活」中表現地最為顯著，而散佈書中的九張插圖都具體描繪出十八世紀中國的物质生活，堪稱引人入勝。然而作者並未因此而忽略了政治制度在中國社會的重要性，甚至在開宗明義的第一章就對清代政治結構及政策作了相當清楚準確的描述。不過這兩點尚非本書最大的長處，本書最值得稱道的是：第一，作者能對清代經濟發展（包括水利、開荒移民等政策、都市化、農業生產制度、貨幣及信貸制度、外貿、人口變化等問題）作非常扼要的綜合說明。第二，作者強調中國國內各區域間的各種差異。為此，她們用了將近一半的篇幅來描述十個區域（華北、江南、長江中游、東南沿岸、嶺南、西北、長江上游、西南、東北、臺灣）的歷史、經濟和社會發展，尤其注重這些區域內少數民族情況。有些區域，譬如西北及東北，資料儘管比較不足，它們所佔的篇幅並未因而減少。作者如此安排，是為了說明大清帝國內的極端複雜性，同時藉以強調邊區社會的重要性並不遜於中心地區。就這兩個貢獻而言，本書是如實地反映了近年來美國學者研究中國的重點所在及豐碩成果；史坦福大學教授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在本書的分區討論方面的影響就非常明顯，其他美國學者對清代邊疆社會的研究（包括史學及人類學的研究）也為本書提供了許多不可缺少的寶貴資料。

由於本書乃綜合中英文為主的二手研究而成，它自然無法精細地討論這些二手研究比較忽略的問題。例如「物質生活」及「價值與信仰」兩章即顯得較薄弱，讀者難以從這兩章中知道十八世紀社會在這些方面與其前後時代有何不同；至於有關生命週期及節慶的幾段也多半是人類學式的靜態描述，缺乏有關「變」的歷史式的討論。同樣地，在討論宗教及下層社會等問題（如械鬥）時，作者對臺灣嶺南區的描述較為詳細，其他地區則著墨極少。這是因為人類學家在臺灣和嶺南作田野調查的機會較多，可惜他們研究的歷史深度不够，連帶之下，本書也有相同的缺憾。本書這些弱點其實正說明了當前清史研究的不足之處，學者的興趣主要仍在於經濟及政治的發展，而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他們的精神思想等問題的研究仍在起步的階段，與歐洲社會史研究的水準相距尚遠。

本書不是洋洋鉅著，前後才兩百多頁，但對初學清史的人及研究其他文明的學者來說，卻是一個很好的入門書籍。除了相當扼要而豐富的內容之外，本書所附二十頁的參考讀物介紹，也很有價值。對清史專家而言，本書毫無疑問也值得一讀，尤其目前專題研究的書籍汗牛充棟，而綜合性的、通論式的著作卻如鳳毛麟角，對於近代中國史的認識，往往令人有見木不見林之感。本書正好補足這個缺點，它給讀者一個寬廣的視野。筆者希望不久的將來也能見到同類的中文著作。

□梁其姿□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1750-1950. By Susan Man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viii pp. Bibliography, Character List, Index. 278 pp.

過去學者在研究明清時期政府與商人的關係時，選取對象多為以地緣或行業稱雄一方的鉅商，如山西商人、新安商人、廣東十三行行商和揚州鹽商等。這些鉅商一方面託庇於政府蔭翼下而腰纏萬貫，另一方面，也因擺脫不了國家機關的羈絆，所以不能進一步發展，甚且經常發生倒閉的現象。這批大商人儘管在經濟上舉足輕重，但就全國來說，仿如冰山一角，是一種特例而非典型，代表性頗為有限。對這時期的政府是否窒礙商業發展或對商業發展一無建樹，學者意見紛紜，宋漢理(H. T. Zurndorfer)及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等傾向於認定明清政府的政策「務實」或「具潤滑作用」，為私人部門的逐利提供相當多的機會或資源，使私人部門經濟充滿活力。相形之下，有關國家官僚與地方勢力的微妙關係，頗為研治中國近代史的學者所忽視。近十年來，這種情況才稍有改變。經孔復禮(Philip Kuhn)、Prasenjit Duara 及本書作者 Susan Mann 的辛勤耕耘，清末民初地方商業權力結構的輪廓才逐漸呈現出來。以往學者總認為十九世紀中葉後，中央權力式微，無法控制地方精英份子；國家向市場徵稅時，常被迫與租稅包收人或其他各類地方中介勢力妥協。他們也認為這正好說明官僚帝國在土崩瓦解之中，而地方勢力逐漸抬頭。Philip Kuhn, Prasenjit Duara 及 Susan Mann 則提出修正的看法，他們力言清末民初國家利益與地方當事人的關係，錯綜復

雜；國家力量不斷擴伸，而無政府狀態也與時俱增，從而出現弔詭的情況。

本書作者 Susan Mann，執教加州大學 Santa Cruz 分校，為該校歷史系副教授。在書中，作者選取包稅制來查驗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如何從傳統農業國家轉變為結構膨脹中的國家，並以地方市場為研究焦點。十八世紀盛清之時，支配市場的秩序是透過地方精英份子與政府官員的協商而達到目的；政府政策如低稅、把稅收交給地方商人承包和制止官僚從中干擾，大大支援了前所未有的商業擴張。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新稅層出不窮，而官僚國家也日益膨脹，這擾亂了市場的舊秩序，引起持續數十年的官民衝突和重新協商。這些衝突及協商，正是本書的討論核心。

除導論外，全書可分為兩部份。第二章到第五章為本書的前半部，主旨在闡釋中國商業中心的地方領袖與政府之間的傳統關係。第二章申言商人在中國歷史上的角色並不明確，但到清代，他們在統治地方的非正式體制中佔有穩固的地位。第三章顯示出商人在地方政治中地位穩固是滿清統治下的特色。這項特色可追溯至宋代的商業革命到清代才完成。第四及第五章描述盛清之世為商人稱雄地方市場的黃金時代。

在本書的後半部(第六章到第十一章)，作者指出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連串財政危機迫使政府抽收厘金及其他新稅，因而擾亂了市場的舊秩序；行會、捐客紛紛組織起來，抗拒政府的各種措施。其他商人也暗中運用其影響力，向各方疏通，藉此保障他們的腰包及包稅特權。這樣一來，反而招徠政府更多的干預。在整段民國時期，地方商人與國家官僚為爭奪租稅而衝突，且愈演愈烈，為地方精英份子與國家之間的一系列新關係鋪路。作者指出當國家權力侵入地方政治和經濟領域時，經常都必須與靠才智技巧來維護其利益的地方當事人妥協。就作者看來，這種與包括包稅人在內的妥協，不單是「有用」的，對締建中國現代國家的政治人物來說，是「到成功之途必需的步驟」，為建國過程中進兩步、退一步的短暫階段。作者也認為這種妥協，在中國實有其清楚的歷史根源，可視為地方社會抗拒官僚化的表徵。

在這後半的五章中，首三章敘述十九世紀末為衝突瀰漫的時期，同時也預示了現代國家締建過程的到來。其中第六、七兩章檢討厘金對某些地方經濟的衝擊，藉以說明當政府面對朝代危機，把注意力集中到恢復秩序方面；事實上，卻正標誌著市場秩序已開始出現明顯的轉變。第八章則探索本世紀初，國家怎樣面對並致力解決它與地方商業利益階層與時俱增的衝突。第九章中，作者申言民國政府不單沒有解決國家侵入市場與傳統非正式管治方式